

中国共产党筹备“一苏大”的波折经历

□ 周铁钧

1930年,工农红军浴血鏖战,赢得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,鄂豫皖、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武装力量不断拓展、壮大,红色政权相继建立,中央苏区一片欣欣向荣。

1930年2月3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筹备“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”(以下简称:苏域会)等问题,在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提议下,成立了由中共中央、总工会、军委、农委、共青团及革命团体组成的“苏域会”筹委会,为召开“中华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”(以下简称:一苏大),成立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”展开准备工作。

同年2月7日,“筹委会”决定:1930年5月20日在上海秘密召开“苏域会”,要求各苏区选出2至5名代表,红军每个军选派1名代表,游击区、革命团体、工农群众代表由各地酌选,做好出席会议的充分准备。

“中央特科”在会场内外布置了三道防线

1930年5月,“苏域会”秘密召开在即,当时,浦江两岸白色恐怖肆虐,保护代表和会议安全,就成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(以下简称:特科)最为重要的任务。“特科”1927年11月成立,主要承担中央机关和党的重大活动安全保卫;收集、传递情报;惩治罪大恶极的敌特、叛徒和隐蔽战线上的各种秘密任务。时任“特科”总务科长的洪扬生、情报科长陈廉、保卫科长顾顺章等人反复磋商,认为众多与会代表长时间聚集,极易引起敌特注意,必须建立一个经营性场所掩护。几经权衡利弊,决定建一所医院,让会议代表、保卫、工作人员等全部乔装成医生、护士、患者进进出出就不会引人怀疑。

征得中共中央同意,“医院”筹建工作紧锣密鼓进行。此时,陈廉收到一个惊人的情报:敌特机关已探得“中共将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”的消息,虽尚不知会期、会址、人员等细情,但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已悬赏50万大洋收买线索,并命令密探、特务倾巢出动、搜视细查。

情况紧急,“特科”立即向上级请示,是否推迟会期?而此时,中共中央已将召开“苏域会”的决定向共产国际正式报告,并得到批准,各地代表也都出发赶来上海。箭在弦上,不得不发,中共中央指示:会议如期举行,但要动用一切手段、条件做好保密、保卫和防范工作,确保万无一失。

5月中旬,上海派克路(今黄河路)、白克路(今凤阳路)交汇处的卡尔登影院附近,一家四层小楼的私立医院开业,它的出现虽悄无声息,但周边的酒吧、舞场、咖啡厅、麻将馆等,却每天灯红酒绿、人声喧嚣。

私立医院是“特科”为“苏域会”准备的会址,敌人绝想不到,共产党居然在繁华的闹市召开秘密会议。为确保安全,“特科”在医院内外布置了三道防线,一是医生、护士、职员、杂工等全是“特

科”队员,他们衣襟内都掖着机头大张的驳壳枪。住院“患者”和“陪护亲属”则全是会议代表,如真有病人上门,“医生”会讲出各种理由,把他们转介到附近的一家“真”医院就诊;二是一楼的后窗全部打开,跳出去就可进入另一幢楼房,既可临时避险、又可迅速撤离;三是在医院周围和附近街道上,部署了60多名哨哨,乔装成商贩、鞋匠、车夫、行人等,一旦情况紧急,他们即会出手,殊死搏杀。

1930年5月20日上午9时许,“苏域会”在“医院”四楼召开,参加的代表共50人,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伯特斯也出席了会议。大会推举周恩来、项英、李立三和未到会的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等1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,李立三代表中国共产党作政治报告,宣布“中华苏维埃政府”10大政纲。而后3天的会期里,王宏、项英、王大沅分别作《苏维埃组织法》《劳动法》《红军问题》报告,代表们讨论、修订、通过了《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》《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》《暂行土地法》等重要议案。

大会还作出两项重要决定:一是成立“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”(以下简称:中准会);二是1930年11月7日(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)在上海召开“一苏大”,成立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”。

此时,敌特机关又得知了中共的开会地点大概在派克路、白克路一带,便对这一区域展开地毯式搜查。这时,警备司令部密探再生提议:要“有门必入、有人必问”宁愿错抓也绝不疏漏,提议大得熊式辉赞赏,他命再生带带队,发现可疑人立即逮捕。

宋再生公开身份是警备司令部密探,实际是打入敌人内部的“特科”人员,为拖延时间,他才机智地提议“细搜”。5月22日,警备司令部传来命令:有工人在租界罢工示威,马上去现场驱赶,平息闹事。原来,这是“特科”的刻意安排,调虎离山,为会议赢得时间。5月23日午后,敌人搜到“医院”时,“苏域会”已结束,人尽散去,楼房里空空荡荡,看不出一点曾开过会的痕迹。

受“左”倾错误影响国民党“围剿”干扰会期数次延迟

1930年9月12日,“中准会”在上海召开全体会议,讨论通过了《“一苏大”代表选举条例》和《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》,审议、修订了准备提交大会的《宪法大纲》《劳动法》《土地法》以及经济、军事问题等决议草案。

当时,受“左”倾错误路线危害,全国十几个中共省委机关相继被破坏,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毒手,许多地方党组织需要恢复或重建。为此,“中准会”决定将原计划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“一苏大”,推迟到同年12月11日(广州起义纪念日)在江西苏区召开,“中准会”也同时转移到苏区继续开展筹备工作。

1930年10月,蒋介石调集重兵向湘、鄂、赣苏区发动大规模进攻,迫于严峻形势,“中准会”10月18日在上海召集12个革命团体代表开会,决定将“一苏大”会期改为1931年2月7日(二·七大罢工纪念日)。

1931年1月,项英受中共中央委派,来江西组建苏区中央局,向毛泽东、朱德等红军领导人,传达了“中准会”在江西苏区召开“一苏大”的决定。但此时,“中准会”秘书长林育南携带大量会议文件,从上海秘密赶来江西,不料他途中遇险,被迫返沪不久被捕,壮烈牺牲,“一苏大”也因此再次延期。

同年5月,中央红军取得第二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,苏区中央局发布《第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》,决定1931年8月1日(南昌起义纪念日)召开“一苏大”。不料同年7月,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“围剿”,中共中央决定将“一苏大”会期再次改为11月7日。

1931年初秋,毛泽东、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来到瑞金县,听取了县委书记邓小平的情况汇报并实地考察,认为瑞金地处红色根据地中心区域,周边有武夷山、紫华山环抱,地势险要,易守难攻,人民对敌斗争经验丰富,群众基础扎实。经商议决定,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设在此地,并向中共中央建议:召开“一苏大”,成立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”的地址也选在瑞金。

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与苏区通过电报联络,批准了毛泽东等人的建议,确定了“一苏大”的会议日程、人选名单等,并派人将各种议案、法规、通告等会议文件送抵苏区。

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正式诞生

1931年11月7日早晨,初冬的瑞金笼罩在阵阵寒意中,来自湘、赣、鄂、琼崖等地苏区和红军、全总以及革命团体的610名代表,满面春风地从各个方向朝“一苏大”会场:叶坪村谢家祠堂汇聚。上午8时许,“一苏大”隆重召开,项英代表大会主席团致开幕词,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作《政治问题报告》。而后,全体代表来到村东的草坪,观摩了盛大的阅兵仪式,中共中央向红一军等10个军团授予锦旗,为彭德怀、方志敏、王稼祥等8位红军将领颁发勋章。

后来的会期里,代表们相继讨论审定、表决通过了《宪法大纲》《土地法》《劳动法》《婚姻条例》《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》等法律法规议案,同时选举产生了由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项英等63人组成的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”中央执行委员会,宣告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”正式成立。

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”的成立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,为劳苦大众构筑起一座坚实的靠山,把工农革命斗争步步推向高潮,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权建设奠定了深厚的基础,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

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设立土地委员会的同时,各县、区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了土地委员会,设土地委员长1人、委员若干人;各乡、村都有1名土地委员。他们紧紧依靠和组织雇农工会和贫农团,调查各乡村土地占有情况,宣传土地分配政策,丈量核实土地,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分配土地和财产。

在这场深刻而复杂的阶级斗争中,陕甘边区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,总是站在土地革命的最前列。时任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长的张步清,随着闹革命带来经济地位上的变化,逐渐贪图个人发家致富,工作不积极,疲疲沓沓。刘志丹、习仲勋等经过研究决定,撤销了张步清政府土地委员长的职务,由从陕北逃荒落脚到南梁的贫苦农民李生华接替土地委员长职务。李生华革命热情高,积极肯干,土地改革工作很快有了很大进展。

为了使相关政策得到充分贯彻执行,在习仲勋的带领下,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和各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干部,整天走东村串西村,和贫苦农民同吃同住,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,组织和发动群众。南梁中心苏区的群众被充分发动了起来,斗地主、分田地的斗争搞得热火朝天,并逐步向整个陕甘边区迅速推进。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,无论工作怎样繁忙,也要亲自接待因划定阶级成分等问题而来访的农民群众,及时深入调查研究,纠正土改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偏差。

习仲勋亲自领导打土豪分田地斗争,带领庆阳游击队抓获了紫坊坪拓儿掌的一个恶霸地主,没收其银元1000多块、粮食500余石、羊2000余只、牛100多头,分给了南梁的贫苦农民。又到白庙川发动群众打土豪,处决了一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劣绅,给贫苦农民分配了大批牛羊和3000多亩土地。这些胜利成果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,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轰轰烈烈的迅猛发展。从南梁中心苏区到陕甘边南区的广大根据地人民,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土地革命斗争,以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为了巩固和发展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,发展根据地的经济,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发展农业、牧业生产的措施。南梁和陕甘边界贫苦农民虽然获得了土地,但广大农民的生产资料和耕畜极其缺乏,在生产上仍困难重重。据此,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县、区红色政权拨出有限的资金解决贫苦农民生产急需,红军还经常派出小股部队,神出鬼没地潜入敌占区,拉土豪,抓劣绅,没收浮财,赶回牛羊,分配给根据地的农民群众,扶持他们发展生产。杨森师长曾率领骑兵团深入陕西长武、韩城等地捉拿土豪劣绅,带回了大批财物,支援根据地人民的生产。

为了改变根据地农民群众缺少牲畜的状况,南梁政府还大力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,并从政府办的牧场中,提供牛、驴、马匹给贫苦农民,帮助他们解决生产急需。南梁政府明令宣布不向农民征粮和接受农民捐献粮,使陕甘边区的农民群众得到了休养生息,农业生产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。

(文章节选自《南梁革命根据地史》·连载二)



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



趣谈古代投壶

□ 卜庆萍

在古代,宴饮时有投壶之趣。它既是一种宴饮礼仪,也是盛行民间的饮酒娱乐游戏。

东汉郑玄为先秦典籍《礼记·投壶》作注时说:“投壶,射之细也,射为燕射。”古时燕与宴同义,燕射即饮宴时的射箭活动,表明投壶是由古射礼的燕射演变而来。古时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。那时成年男子不会射箭被视为耻辱,主人请客人射箭,客人是不能推辞的,可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,就用箭投壶代替。久而久之,投壶就代替了射箭。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载:“晋侯以齐侯宴,中行穆子相,投壶。”就是说,春秋时,两国诸侯宴饮中就举行了投壶之礼。

投壶,即投壶人站在离壶一定距离的地方,把矢投向壶中,中多者为胜。它是一种古代宴饮礼仪,又是一种娱乐游戏。最早出现于西周,战国、汉唐时期盛行,宋代以后逐渐衰落,一直延续至清代晚期。

投壶舍弃了箭之武,保存了投之礼,注重从容安息,养志凝神。每次宴饮,皆“弹瑟曲,行投壶之礼”。随着历史的发展,投壶又从宴饮礼仪逐渐变为高雅娱乐游戏,后来在民间广泛流行,民间以投

壶为乐现象越来越普遍。投壶不断发展,不仅产生了许多新名目,还增加了难度,有人别出心裁地在壶外设置屏风盲投或背坐反投,投壶特有的魅力和趣味性,为人们广为接受和喜爱。投壶在中国古代相当流行,那时有不少投壶高手,明代有个叫苏乐壶的人,因投壶技术高超,被人称为“投壶绝”。沈榜在《宛署杂记》中记录了苏乐壶的绝技,称他不仅能背身投壶,还能用3枝矢同时向3个壶投射,且从不失手。

投壶所投之矢用柘木或棘木做成,不去皮,形状一头尖,一头齐,似设羽之箭。矢有三种长度:二尺、二尺八寸、三尺六寸,分别适用于室内、厅堂和庭院,壶中放置起缓冲作用的小豆。唐李贤注引《礼记·投壶》曰:“壶中实小豆焉,为其矢之跃而出也。”

古代投壶有严格的规则,鼓乐响起,宾主双方分别把矢投向壶中,每投进一矢,由司射给投中者放上一“算”。“算”即用来计算投中数目的用具。投壶依次进行,抢先连投者即便投入司射也不给“算”,大概“不算”一词即由此而来。四矢投完为一局,司射为胜者“立一马”,共进行三局,谁立三马,就算取得最后胜利,负方饮酒作罚。



正宁民间舞蹈——霸王鞭

□ 师正伟

正宁霸王鞭,俗称打花棍,集舞蹈、武术、体育于一身,以节奏明快,粗犷豪放,铿锵有力,欢乐祥和的独特风格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。据说,这种民间传统娱乐性艺术活动最早兴起于秦朝末年项羽的军营中。将士们打了胜仗后,便欢欣鼓舞地跳起来,唱起来。一些士卒用木棍或竹棍一人单打或两人对打,还有的人多人一起打。他们不断地变换队形、动作,极力表现出无比喜悦的心情。项羽就是西楚霸王,后来就把这种打棍的舞蹈形式叫做“霸王鞭”。

霸王鞭的主要道具为“花棍”。花棍,顾名思义,花色的木棍。花棍,用拇指粗的柳、杨木或竹竿做成。长1.2米左右,全部用红、绿、蓝、黑、黄等颜料相间涂抹,或者缠上彩色布条,两端挖开5厘米左右小口,串上四枚铜钱或铝铁片,再拴上50厘米长的红绸或绿绸。这样,舞动起来,叮当作响,彩绸飞舞飘扬,格外醒目好看。霸王鞭表演时,根据具体情况,可两三个人表演,也可多人表演,队员少则二十几人,多则三、五十人,乃至上百人不等。

霸王鞭分单鞭舞和双鞭舞两种:单鞭舞表演者右手持鞭,左手持花或红绸,随吹打乐行进表演,节奏明快、刚柔并济,舞姿优美,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。双鞭舞者双手持鞭,忽上忽下、时左时右击打自己的肩、背、腰和四肢,铜钱发出清脆的响声。队形不时交叉变化,出神入化,错落有致,舞姿优美,音乐明快,博得观众的阵阵喝彩。

霸王鞭的表演形式主要有大场、中场、小场。一般开始和结束为大场,即以变换队形为主的大型集体舞,表演人数一般在50至100人之间,主要表演不同队形的变化。常用队形有“满天星”“八卦阵”“单双圆场”“纵变横”“四变二”“二变一”“龙头串尾”“龙尾接头”“单阵”“双串”“S形串”等形式。中场是5至10人表演的打棍技巧。小场穿插于中场,是3至5人表演的带有简单情节的独舞、双人舞。霸王鞭的表演场地主要在大街、场院或空场上,突出技巧的中小场亦可在舞台上。伴奏乐器有:唢呐、二胡、板胡、三弦、打击乐、木鱼、碰铃、锣鼓。表演者的着装饰物,一般是男身穿一身黄绸彩服,头扎彩巾,脚穿黑(黄)布底彩鞋;女身穿一身红(绿)绸彩衣或红绿相配的彩衣,脚穿红或绿色的布底绸彩鞋,头上插花,腰扎红(绿)绸彩带。整个舞蹈有一定的套路、规律和节奏,快慢结合、轻重有致,高低错落、刚柔兼具、富于变化,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霸王鞭的传统表演动作主要有打、推、转、挑、翻、摆、摇、摆、

甩。步法有立、跪、蹲、坐、卧、行进、停留、跳跃等。中间配民间小调,边扭边唱边打自己的臂、腿、肩、腰、背、脚心、膝、胯、肘、手掌等部位,也可棍与棍、棍与地撞击。表演技巧主要有:“前后打”“左右摆”“拐肘打”“背肩打”“脚踢打”“抡花打”“十字打”“三角打”“对打”等。“前后打”是表演者双手握棍、上下竖直、双臂前伸,双棍碰击或双臂后置碰击,也可上举头顶或下伸大腿两侧碰击;“左右摆”是表演者双手握棍向左或向右进行碰击;“拐肘打”是弯起左(右)肘碰击右(左)花棍;“背肩打”是左手花棍碰击右肩,右手花棍碰击左肩的交叉打击“脚踢打”是左(右)脚弯起踢打右(左)花棍的上部;“抡花打”是左右手花棍交叉上下左右轮番碰击;“对打”即两人面对面以相同的动作碰击对方花棍;“十字打”和“三角打”即行进步伐中的花样碰击和随身步扭动的旋律舞动打击花棍。击打分十二下、十四下、十六下,花棍在打(碰)击时,发出有节奏的“咣咣”“哗啦”的响声,彩绸飞舞,花棍旋转,五颜六色,听起来节奏整齐,铿锵悦耳,看起来如车轮齐转,呼呼生风。

霸王鞭在正宁民间流行已有500多年的历史。明清年代最为盛行,不仅是人们庆贺丰收、欢度佳节以及自娱自乐的歌舞形式,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祭神或祈雨禳灾的一项重要活动。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,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作,表演形式与内容上加入了反映革命胜利、人民幸福的时代特征,使它真正成为服务人民、鼓舞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。特别是进入新世纪,在省、市文化部门的大力帮助指导下,本地艺术家对霸王鞭又作了进一步的艺术加工和改造,使霸王鞭艺术水准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具体表现在打法上比较灵活,突出了群众性健身功能,一般是右手握住木棍中间,身体或直立或两腿站成马步,忽上忽下、时左时右地轻轻击打自己的肩部、背部、腰部以及四肢;舞动花棍,脚走出十字步,有的还可以躺在地上,忽上忽下、时左时右击打地面;或者忽上忽下、时左时右地轻轻击打他人,两个人相互轻轻击打。多人打时,可以变换位置,可以变成各种队列,边走边打,同时添加了一条街“打西门”“五梅花”“金鸡打架”“二龙抢宝”“走八字”“套葫芦”“龙摆尾”等许多新的程式和套路,并配以现代音乐,使霸王鞭的形式与内容更加协调、融合,既具有浓郁的乡土韵味,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,呈现出一种欢庆、热烈、祥和的基调,抒发一种浓厚的黄土高原文化气息,反映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精神风貌。